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抗日英烈许子和：侠义柔肠勇护乡里

在河南南阳宛城区溧河街道夏营村，位于村头的“南阳许烈士和抗日纪念碑”静静矗立，石碑上洋洋洒洒数百字，向世人讲述着这位抗日英烈的无畏气概。

记者来到许子和外孙张敏老人家中。提起外公，今年72岁的张敏滔滔不绝：“打记事起，就听母亲和老一辈人讲外公的故事。他身材瘦高，勇猛过人，枪法精湛。”

许子和，本名文忠，字子和。1909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县溧河乡程胡庄，即今日的夏营村。他幼读私塾，成年后加入爱国将领冯玉祥部当兵。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胸怀家国大义的许子和受党组织派遣，同中共地下党员张树康一起回南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地方创办“抗日战地话剧团”，结合当时的抗日救亡形势，排演《放下你的鞭子》《卢沟桥的枪声》等剧目，不仅激励了人们的抗日斗志，还借机秘密发展了共产党员。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医用酒精等军用物资匮乏。1940年春，为支援中共地下党员邵士芳开办的酒精厂，许子和通过自家建立的酿酒作坊生产白酒，送给邵士芳作为酒精原料。

“我妈总会提起，外爷平日里为人豪爽、仗义疏财，自幼习武又有从军经历，因此在方圆几十里都颇有名气。”张敏骄傲地说。

1945年春，日军侵占南阳，许子和召集当地抗日义士，聚枪100多支，成立“宛南抗日游击队”，并被选为大队长。农历三月三日上午，一小队日军窜至当地玉皇庙附近，四处抢掠。许子和得知消息后，立即与骨干队员商议，决定一面集合游击队员做好战前准备，一面派人与驻扎附近的主力部队联系，由主力部队担任主攻，游击队配合作战。

战斗中，许子和左腕受伤，仍继续向前冲，又身中数弹。他忍着剧痛对队员们说：“我不行了，这一仗非打好不可，叫日本人知道我们中国人厉害！”最终因伤及要害，壮烈殉国。至下午五时，这股日军被全部歼灭。

侠肝义胆、保卫家乡的游击队长许子和牺牲了，但他的故事流传至今。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慕名前来瞻仰。80年时光流转，许子和长眠于家乡的土地上，见证着宛南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和众多烈士们的英勇事迹也将通过文字、代代口述，永远地传承下去。（据新华社）

见证人民军队诞生的怀表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这是一块由瑞士制造的金壳怀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时任起义军总指挥的贺龙同志正是用这块怀表精准对时，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年7月中旬，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决定于7月28日晚在南昌举行暴动。7月27日，周恩来赶到南昌，与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共商起义大计。考虑到部队行军匆忙，贸然发动起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不大，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改在7月30日晚举行。

7月28日，周恩来在二十军军部会见贺龙，面告起义计划，并征求意见。贺龙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尽管当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仍然以前敌委员会名义任命他为起义军总指挥。7月30日晨，以中央代表身份前来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的张国焘从九江赶到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起义时间被再次推迟至1927年8月1日凌晨4点。

起义前夕，贺龙把这块怀表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将时间调整到最准确的位置，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起义军将士们颈上系着红布带，左臂上扎着白毛巾，马灯、电筒上贴着红十字。贺龙紧盯着怀表，静静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不料，7月31日晚，二十军中的一个副营长突然投敌告密，情况十分危急。

为确保起义顺利打响，前敌委员会当即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凌晨2时，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按照预定部署，以“河山统一”为口号，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战斗异常激烈，贺龙的指挥部和敌人隔街相望，距离不到200米。贺龙、刘伯承站在石阶上，观察情况，指挥作战。流弹不时在他们头上呼啸飞过，他们从容不迫，处之泰然。经过4个多小时的血战，起义部队一举歼灭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成立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8月1日又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南昌起义也因此成为人民军队光辉历程的起点。这段峥嵘岁月，也成为贺龙同志革命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转折。因为南昌起义，贺龙同志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紧密相连，他亦从一位旧军人彻底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58年，贺龙将这块见证了人民军队诞生的珍贵怀表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之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经过军事博物馆同意，照原样复制了一块，在纪念馆陈列展出。（据《学习时报》）

车桥战役：拉开华中抗战战略反攻序幕

走进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的车桥战役烈士陵园，镌刻着“车桥战役英烈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巍然矗立，一旁的石碑记录着战役经过和53名烈士的部分名单。细看碑文，81年前的激战场景，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肃然起敬。

车桥是一座千年古镇、商贸重镇。1943年，被日军侵占后，车桥成为其控制淮安东南、宝应东北地区的重要据点。夺取车桥，对我连通并扩大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怎么打车桥却让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大伤脑筋。日军在车桥建了大量碉堡、圩墙，挖了一丈半的外壕，布置了极强的火力。此外，一旦车桥战役打响，驻扎在周边的日、伪军必来救援，可能对我攻城部队形成包围。

通过侦察，“攻坚打援”的构想在

粟裕心中逐渐成熟起来，他命令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兼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叶飞担任前线指挥。1944年3月5日凌晨，一颗信号弹划破夜空，车桥战役正式打响。一时间，枪声大作，喊杀震天。战士们迅速突破外壕，越过墙头，占领镇内全部街道，成功分割包围日、伪军各据点。

在车桥战役烈士陵园展厅内，记者看到一个特别的微缩模型：一名新四军战士站在碉堡顶上，一手拿着十字镐，一手拿着手榴弹。讲解员杨颖介绍，战士名叫陈福田，力气很大，用十字镐在敌军碉堡顶部硬生生凿出了一个洞，将手榴弹全部扔进碉堡，“这充分反映出新四军指战员们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崇高精神，就是铜墙铁壁，也要凿开它”。

淮安作家协会主席于兆文长期研究车桥战役。他在出版的小说

《车桥 车桥》中，生动再现了那段光荣的历史。他介绍，车桥战役的胜利得益于周密的战略部署、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更离不开老百姓这座最大的“靠山”。

“新四军要什么，老百姓就支援什么，大量船只、柴草、煤油、粮食等物资迅速筹集完毕。为架设船桥，村民们拿来了家里的门板、铺板、跳板、牛绳、树棍……”于兆文说，车桥战役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新四军强攻车桥，周边日、伪军仓促增援，沿途遭我军顽强阻击，伤亡惨重。车桥战役共毙、伤、俘日、伪军近千人，攻克敌军碉堡53座。

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张春荣介绍，车桥战役对华中乃至全国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一举打乱了日、伪军的“清乡”和“屯垦”

计划，拉开了华中抗战战略反攻序幕。

离开车桥战役烈士陵园，驱车行驶在车桥镇，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现代化的厂房、穿着新潮的年轻人映入眼帘，新时代的车桥焕发出勃勃生机。

尽管经历了沧桑巨变，车桥战役这段红色历史始终铭刻在人们心中。“每年，我们都会组织中小学生学习、党员干部到烈士陵园参观学习、缅怀先烈，自发前来参观的群众更是接连不断。”车桥镇党委副书记万士俊说。

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车桥镇依托党建引领，大力发展实产业，全镇实种植面积达3.5万亩，实深加工产业链不断延伸，串联红色景点与实田园的旅游线路加快打造，当地百姓正在红色基因传承与乡村振兴中收获越来越多的幸福。（据新华社）

世界杯如火如荼，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射门、抢断、传球，都牵动着全球观众。很多人以为足球狂飙是现代产物，其实不然。作为世界足球的起源地，中国古代的蹴鞠赛场，早已上演过千年不息的绿茵激情。没有高清直播，没有荧光棒，没有大屏幕，古人的观球快乐，早已揉进春风街巷、楼台庭院，写进诗词、歌谣里。



宋代蹴鞠纹青铜镜。



宋代红陶胡人踏蹴鞠俑。

蹴鞠的时代演变

汉代 蹴鞠已是训练士兵的手段，制定了较为完备的规则

三国 出现了表演性蹴鞠和竞赛性蹴鞠

唐宋 蹴鞠活动达到高潮，出现了按场上位置分工的踢法

明代 蹴鞠仍广泛流行

清代 开始流行冰上蹴鞠，中叶以后，蹴鞠逐渐被欧洲的现代足球所取代

诗词里的中国「足球热」

古代球迷也疯狂

早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是齐国都城临淄最风靡的市井乐事。《战国策·齐策》留下最早的文字记录：“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笙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

彼时的临淄城，集市空地上随处可见踢鞠的百姓，朴素的竞技快乐，应是华夏足球文化最初的底色。步入秦汉，蹴鞠完成了从民间玩乐到规范化竞技的蜕变，既可作百姓闲时消遣，亦为军营练兵之法。东汉文人李尤写下《鞠城铭》，镌刻下世界最早的球类赛事规则：“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

字里行间满是古人对公平竞技的理解。河南博物院馆藏的汉代蹴鞠画像石，就复刻了彼时赛场图景：乐师击鼓伴奏，两名武士身着劲装对峙踢球，一旁贵族端坐观赛，鼓乐齐鸣，竞技酣畅，是汉代全民热爱蹴鞠最直观的物证。《史记》中记载了最早的“狂热球迷”项处，身患重病仍不顾医嘱执意踢球，最终呕血而死，死在2000年前的临淄。

盛唐时，寒食、清明前后，蹴鞠和秋千是朝野最盛行的娱乐方式。诗人王维曾在寒食时节漫步城东，撞见一场热闹的蹴鞠对决，提笔写下“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寥寥几字，画面感拉满。韦应物更是捕捉到军营里的别样欢腾，一句“遥闻击鼓声，蹴

鞠军中乐”，让盛唐军营的蹴鞠团建场景跃然纸上。

同为唐人，曹松笔下的蹴鞠赛场更具烟火气：“云间影过秋千女，地上声喧蹴鞠儿。”街头巷尾，少年们肆意驰骋踢球，脚下蹴鞠翻飞不停，赛场边人声鼎沸，笑语喧哗。邻里百姓、出游路人纷纷驻足围观，没有身份隔阂，不分年龄长幼，人人沉醉在这场热闹赛事里，妥妥的古代“路人球迷”。

到了崇文尚乐的南宋，蹴鞠彻底火出圈层，从民间街巷走进宫廷宴席，催生出无数资深球迷与传奇赛场故事。宋代蹴鞠风靡之盛，足以改变人生际遇。市井出身的高俅，凭借一身精妙绝伦的蹴鞠技艺得到端王赵佶的赏识。

宋代踢球群体包罗万象，宋徽宗就是资深爱好者，他的宫词“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角输赢”，记载了宫廷内的对垒场景。民间赛场更是惊艳，女子蹴鞠成为一道清丽飒爽的独特风景。宋代诗人汪元量的“舞余燕玉锦缠头，又著红靴踢蹴鞠”，记录了红衣女子踢球竞技的场景，她们身姿轻盈，娇柔与英气兼具，温婉与活力并存，想必也有一番“铿锵玫瑰”的风采。

在一众宋代文人中，陆游堪称“铁杆球迷天花板”。他半生遍历山河，也爱写蹴鞠盛况。一句“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

道尽宋代蹴鞠的顶流热度。一方小小的蹴鞠场边，观者云集，万人空巷，摩肩接踵的人群，此起彼伏的喝彩，让春日赛场热闹无双。他还有诗云“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可见这项运动普及之广。

到了明代，民间球迷更是把热爱唱成歌谣：“戏球儿，我爱你一团和气，我爱你有分量高知低，知轻知重如人意。人说你走滚其中都是虚，只这脚尖儿上的风情也，教人爱杀（煞）你。”世人爱蹴鞠，爱其起落有度、轻重有节，爱其一球流转间的万般风情。一字一句，皆是烟火人间最纯粹的欢喜。

清代之后，蹴鞠虽不复唐宋全民竞技的盛况，却化作庭院闲趣、冰嬉雅戏留存下来，宫廷冰上蹴鞠、民间小院玩球的记载不绝。乾隆皇帝在观宋人《闲庭蹴鞠》古画时挥笔题诗“锦靴绣带带毡场”，追慕往昔蹴鞠满场的场景，每逢冬日冰嬉大典，西苑湖面上便上演“圆鞠”赛事，也就是冰上蹴鞠。清人李声振在《百戏竹枝词》中写道：“踢鞠场中浪荡身，一时捷足趁坚冰。”百姓在什刹海冰上结伴踢球，身姿轻快，热闹场景丝毫不输宫廷盛典。

热爱不分古今，热血跨越时光。千年蹴鞠文脉绵延，古人藏在诗词里的观球热忱，让每一场足球赛事，都多了一份独属于东方的浪漫。（据《海南日报》）



元代钱选临摹本《宋太祖蹴鞠图》（局部）。

珍贵的盐罐子

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桂阳县元里村、燕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普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和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地，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

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琳，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感情难却才收下，给了王少琳几张红军货币。

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部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她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她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

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感谢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帮小陈清理好伤口，敷上草药，马上和丈夫王少琳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

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一些用药罐长时间焖熬给伤员口服，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作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

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嘉禾解放才背回来。她常对儿子王先球说，这个罐子不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球将珍藏的盐罐子捐赠给了县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嘉禾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展柜里。罐口有一道裂纹，罐身还残留着当年盐渍的白霜。它很小，小到一双手就能握住；它很普通，普通到放进任何一户农家的灶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见证。（据《中国纪检监察报》）